

未名译库·学术译丛

魏常海 诸葛蔚东 主编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Jindai Tianhuangguan De Xingcheng

[日] 安丸良夫 著
刘金才 徐滔 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731.321
A696

魏常海 诸葛蔚东 主编

-38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Jindai Tianhuangguan De Xingcheng

[日] 安丸良夫 著
刘金才 徐滔 等 译

D731.321
A696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31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日)安丸良夫著;刘金才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未名译库·学术译丛)

ISBN 978-7-301-15757-2

I. 近… II. ①安… ②刘… III. 天皇制度-研究-日本-近代 IV. D731.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168 号

KINDAI TENNOZO NO KEISEI

by Yoshio Yasumaru

© 1992 by Yoshio Yasumar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1992.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year of publication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书 名: 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著作责任者: [日]安丸良夫 著 刘金才 徐 滔 等 译

责任编辑: 李廷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757-2/K·06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ming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11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1.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魏常海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相互影响之大,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罕见的。大概早在姬周之世,中日之间已有交往。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水稻和农耕技术从中国长江流域及华中地区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北九州,这新的文化之光促进日本人摆脱了数千年渔猎和采集生活。此后中国铁制器具传入日本,更使日本由石器时代一跃进入铁器时代。到秦汉时代,特别是自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郡之后,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同时有大批汉人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成为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重要承担者。到隋唐时期,日本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直接交往,大力引进中国的典章制度、文物器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儒学、佛教、文学艺术、民间习俗等各种思想文化,终于促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公元 645—646 年的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结果,日本呈现出“全面唐化”的社会景观,推动了日本社会的飞跃性文明进步,并且自此以后,日本人虔诚以中国为师的理念,一直延续到日本的近世。

自古以来,中国、日本还有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或称东亚文化圈,或称中国文化圈、汉文化圈,或称儒家文化圈,或称大乘佛教文化圈(越南有所不同)。虽然表述方式有多种,但都说明这个文化圈的国家 and 地区关系至为密切,并且有显著的共同性,区别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文化圈的朝(韩)、越、日三国都曾长期

使用汉字汉文,但只有在日本,汉字的使用和影响力一直保持至今,而且用以表达日本国语的两套字母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由汉字的草体和楷体偏旁组成的。日语语汇差不多有一半是来源于汉语,这是两千年来日本人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晶之一,也成为密切联结中国和日本的一条恒久纽带。

到近代前后,日本人把学习的眼光由中国转向西方,提出所谓“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等主张,大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加强对西学的翻译、研究,着力吸取西方的思想文化,实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社会变革——1868年的明治维新。由此日本社会由近世转向近代,并且开始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也就是从此时起,中日两国的景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中国被抛在了后头,日本反过来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兴起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浪潮,全国各地设立各类新学堂,大都延聘日本教师,中国学人纷纷赴日本留学,我国近代历史上一大批先进人物,都曾东渡扶桑,寻求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

这个时期,中国反过来从日本引进了不少用汉字构成的日语新词汇,如我们所熟知的“干部”、“立场”、“手续”、“取消”等,是日本人以汉字为素材来对西文词汇进行的义译,而“俱乐部”、“浪漫”等,则是日本人运用汉字对西语词汇的音译。以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为例,他在明治维新前后就大量使用汉字组词来译介西方哲学中的名词、概念,这些译词有一半左右被认同并普遍使用,中国现今使用的许多基本哲学术语,如“哲学”、“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归纳”、“演绎”等等,都是西周的发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和日本的思想文化交流,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一样,总体上说任何时期都是双向进行的,是相互影响的,不是绝对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客关系常常不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对等的,谁先进谁强大,谁就占据主导地位,先进与落后、老

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可能一成不变,这在中日之间表现的尤为明显。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前后,即日本从近世到近代的转型期,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而且也是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转型期,日本从主要学习中国转向主要学习西方,从后进转向先进,从中国的学生转为中国的先生。因此,深入了解和认真研究日本这个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学习日本的长处,对于加深相互理解,推进中日思想文化的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这个转型期,日本的发展在诸多方面也带有严重的畸形与危险的隐患,因此,对这个时期的日本进行剖析,对于探究日本后来走上侵略道路的原因,对于吸取历史教训,维护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与友谊,也有积极的帮助。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选择编译了论述日本社会从近世到近代转型期的一套丛书,论述近代社会的转型有必要纳入西方的视野,这套丛书也将收编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

编选这套丛书的设想,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杨书澜编审首先提出来的,2004年暑期她找我和出版社的诸葛蔚东博士一起商量,我们都觉得这个设想很有创见,很有学术价值,于是决定共同来做,就拟定了一个方案。诸葛蔚东博士熟知日本的情况,对日本的学术思想颇有研究,日语也非常好,所以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大都是他做的。这里要感谢每本书的翻译者,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我们的心愿才能够实现。当然,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出版社的相关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努力,丛书才得以面世。

限于我们的水平,这套丛书的编译难免有不妥甚或错误之处,诚望识者指正。

2009年4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课题与方法 / 1

1. 天皇之权威 / 1
2. 连续论与断续论 / 8
3. 本书的课题 / 20

第二章 近世社会与朝廷、天皇 / 24

1. 统一权力与朝廷·天皇 / 24
2. 儒者的朝廷观 / 34
3. 祭祀论及其观念的转向 / 41

第三章 民俗与秩序的对抗 / 49

1. 作为社会边缘的民俗 / 49
2. 围绕祭祀仪式的对抗 / 57
3. 异端的宇宙论 / 68

第四章 危机意识的结构 / 76

1. 本居宣长 / 76
2. 平田笃胤与草莽国学 / 82
3. 水户学 / 90

第五章 作为政治领袖的天皇 / 100

1. 尊王攘夷运动的天皇观 / 100
2. 决断主体与马基雅维里主义 / 108
3. 政治战略与民心 / 116

第六章 权威与文明的象征 / 125

1. 维新变革的正统性原理 / 125
2. 神道国教主义的展开 / 134
3. “信教自由”与国家 / 143

第七章 与近代天皇观的对抗 / 152

1. 明治初年的民众运动和天皇 / 152
2. “夷人”与“耶稣教” / 160
3. 有关民俗的对抗和重构 / 170

第八章 近代天皇制的接受基础 / 179

1. 地方秩序和权威中枢 / 179
2. “民权 = 国权”的国家主义 / 192
3. 天皇崇拜的渗透度 / 199

第九章 评论与展望 / 209

1. 关于国民国家的构成原理 / 209
2. 正统与异端 / 213
3. 关于天皇制的宇宙论 / 215
4. 关于现代天皇制 / 220

引用参考文献一览 / 224

后记 / 233

译者后记 / 240

第一章

研究课题与方法

1. 天皇之权威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所谓的天皇,就是我们常在电视上见到的那个人。现今,那个人看上去就象一个几乎与我同年龄的半老绅士。他不胖不瘦,中等身材,给人一种和蔼可亲,诚实可靠的印象。而且,那文雅贤淑的皇后,总是非常礼仪得体地伴随在他的身边。

晚年时的昭和天皇,虽然给人们留下了一些古怪的印象,但仍不失为一个温文尔雅的老绅士。这就是与现代日本社会相称的天皇形象,即使是在今日,依然为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所接受。然而这样的天皇形象,与在国家制度和礼仪中强制于我们的有关天皇的权威性事物之间,存在着大而悬殊的差距。从昭和天皇的病危、病故到新天皇即位所发生的一系列

事情,不得不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在此过程中,天皇的权威就像一张大网那样,完全笼罩了日本这个看似忙忙碌碌和极端浪费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昭和天皇重病后相继出现的“自慎”^①情景。下文有关“自慎”的信息,皆取自于推行民主教育国民联合会编:《为推行民主教育资料集第15辑——天皇的换代》。

在天皇病重消息播出的1988年秋,日本各地的娱乐性集会活动,诸如“祭典”或“庆典”之类的字眼就霍然消失。在电视广告中,诸如“元气(健康)”、“生活的快乐”等话语被消除,在百货商店和超市的食品货架上,意味喜庆意义的红小豆糯米饭也不见了。由于秋季大祭活动的取消,使许多露天商店的营生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因此出现了夫妻一起自杀事件。在神宫球场举行的早稻田大学与庆应大学棒球比赛的现场,作为其象征物的大鼓和华丽的装饰也没有了。据说这是因为在东京六大学棒球联赛开始的第二年,当时作为摄政宫的昭和天皇曾经在这里为优胜队颁发过奖杯。然而这种过分的“自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使得自民党不得不抬出皇太子出来说话,说这种过分的“自慎”不是令人希望的,也违背陛下的心情。神社本厅也发布通告说,诸如“七五三”和“初诣”等个人性节日祈愿活动,应该与通常一样照常举行。这样,红小豆糯米饭也一度改名为“糯米饭”,以只加小豆的“白米饭”或淡颜色的红豆饭形式重新出现在市场上。右翼在街头的闹事活动也自我收敛,日教组(日本教育工会)的教研大会20年来第一次得以在没有右翼骚扰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在此之后,昭和天皇去世时到处悬挂吊旗,各工作单位集体默哀,各电视台有机地配合这种气氛制作特别节目,在戒备森严的警戒状态下的大葬礼、即位典礼、大尝祭,以及长崎市长枪击事件等等,诸事多多。例如在警戒体制方面,在按照事前警察部署而举行大葬礼的当夜,新宿歌舞伎町繁华街的红灯被熄灭,“亚绉匝”(黑社会帮派)组织事务所的大门也紧

^① “自慎”在日语中称为“自肃”。——译者注

紧关闭了。我们知道,“亚绉匝”组织无论是盂兰盆节还是正月过年都是不休息的,而这次却例外。正如“亚绉匝”组织的组长谈其感受时说,“我干了27年‘亚绉匝’,但是像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①。

祈愿康复的签名、文艺活动的“自慎”、悬挂吊旗和表示默哀等,对于企业及其在那里工作的职员们而言,应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应酬礼仪表示。因为他们平时的关心热点,并不在这里。即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应酬礼节,你要参加是非常容易的,而你要拒绝参加则绝非易事。作为每一个工薪职员来说,你要拒绝别人约你一同签名祈愿天皇康复,你要反对悬挂吊旗和拒绝默哀,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围绕着是否挂吊旗或下半旗的问题,有一些大学发起了反对运动,而大学当局都为确保悬挂吊旗的名义而到处奔走做工作。虽然这与工作者的个人感受和思想倾向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但是身为大学的负责人,他一定要千方百计确保悬挂吊旗的这种名义。

一个工薪职员要反对悬挂吊旗或拒绝默哀之所以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是因为这关系着表明他对自己的所属企业和工作单位是否具有忠诚心和协调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虽说与其作为公司职员应履行的职责义务完全是两码事,但一旦采取了拒绝态度,他对企业公司的忠诚心就会受到怀疑,甚至很有可能被视为异类。从每个个人的立场而言,他最希望的是把挂吊旗和默哀理解为少许的应酬礼节行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悲痛哀悼。但是,正是这种少许的礼节性应酬行为,一旦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就会在国民范围内激发起过分同调的、话语权威性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从而成为一种不容许任何批判的巨大权威而君临整个社会。如此一来,那位看似性情温和的生身天皇就会不知何时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权威性凌驾于社会,从而驾驭和支配我们。

最近发现并成为话题的《昭和天皇独白录》,虽然是为东京裁判

^① 《周刊朝日》,1989年3月10日号。

提供证词和辩白做准备的性质,但昭和天皇在其中所讲的基本论点,最后都归结到了一点——他自己作为“立宪君主”,在行动上始终尽了努力。天皇所说的“立宪君主”,意思即内阁和统帅部(军部)所决定的政策和见解,即便天皇个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批准通过,不能用君主大权对其行使否决权。例如1928年炸死张作霖事件,最初田中义一首相说是要采取惩罚方针,而到第二年却上奏说想要敷衍了事,不予追究。对此天皇责备田中的上奏与前言不一,田中内阁因此总辞职。他在《独白录》中把这一事件反省为“年轻幼稚所致”,说:“自从发生这一事件以来,我决意对内阁所上奏的事情,即使自己持有反对意见也予以批准。”^①

在此事件之后,天皇曾经向白川大将下命令不要扩大上海事件,赞成“天皇机关论”^②,反对日德结盟,谋求与中国的妥协等,为抑制军部的蛮横残暴,维持和平做了努力。但是,由于作为“立宪君主”的制约,天皇的意志并没有得到贯彻。这就是《独白录》的立场。《独白录》中还说,就连命令东条英机组阁,也是由于天皇认为这个人“大概能够抑制陆军,把事情办好(贯彻天皇旨意——译者注)”。这样辩白的关键无疑是关于日美开战的问题。书中说,天皇本身是反对开战的,但是他认为:“我作为立宪国的君主,必须认同政府和统帅部一致通过的意见。”这一点,在其“结论”中也反反复复地强调,甚至说:“如果如我所好就批准,非我所好就否决,这就与专制君主无任何差异了。”^③书中还说,天皇基于自己的意志决断的大事只有两件:第一件是“2·26事件”的讨伐命令;第二件是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因为在这两件事情上,内阁等政府机关都处于一种无法下决定的状况,天皇不得不亲自决断。

然而,尽管强调天皇本身这种基于“立宪”的立场,但在《独白录》中

① 寺崎英成等:《昭和天皇独白录 寺崎英成 御用担当者日记》,第23页。

② “天皇机关论”即强调统治权在国家,天皇只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主张,与主张日本国家统治权在于天皇的“天皇主权论”相对立。——译者注

③ 《昭和天皇独白录》,第68页、第75页、第136页。

仍然浓重地表现出了他作为一国君主的政治性。天皇非常了解内外情势,对人物的评价也甚为严厉。例如,天皇对米内光政、东条英机、铃木贯太郎等的个人信任度都很高,而不喜欢武断派的将军和那些大夸海口类型的人。对内阁的人事问题从来是积极参与,在对美开战问题上持忧虑态度也是事实。但是,即便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他的立场仍然是“希望在某个战场上重击敌人,以快速获得讲和的机会”,所以提出战争早结束论的近卫就被批判为“极端悲观论”。^①《独白录》由于这样强调其“立宪君主”的立场,结果也就直言不讳地讲明了其基于独自の“立宪君主”责任意识的积极政治性。现代史研究的专家们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独白录》进行了批评,指出“这里发现的许多材料,足可论证天皇对战争的主体性参与及其战争责任问题”,并说这些材料对于主张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立场的人而言是非常不利的。^②

昭和天皇为在东京裁判时进行辩白而准备的资料,结果却成了现代史专家们论证天皇战争责任的资料,确实颇有意思。《独白录》中的天皇,是一个想要压制主战论,维持与美英协调路线,并为此做出了努力的天皇,也是一个由于“立宪君主”的局限,无心地走上了战争之路的不幸背运的帝王。虽然说日本走向战争之路没有天皇的决断和批准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天皇的立场看,因在其权限和所能负责任的范围内,为避免战争做了不懈的努力,而且决定和批准发动战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就不应追究其战争责任。这就是说,即便是被人们视为集绝对权威和权力于一身的近代天皇,如果基于天皇个人的视点观之,他只是一个权力和责任被严格限定状态中生活的、权力非常有限的人。丸山真男在论述日本法西斯领导者们的精神史特征时指出:这些人经常“以权力所限而逃避责

① 《昭和天皇独白录》,第102页。

② 藤原彰等著:《彻底的验证——昭和天皇“独白录”》,大月书店,1991年,第22页、第19页。

任”，揭露了强权法西斯体制实际上是“无责任体制”的实质。^①如此说来，天皇也是在以权力所限而逃避责任，可说是“无责任体制”的一部分。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天皇在1975年会见日本记者俱乐部人士时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发言：“关于这一话语的情节，由于我对那些文学方面没有研究，知之甚少，所以对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这句话在其后成为人们谴责和嘲笑的材料。在谈到“所谓战争责任”时，天皇以自己作为“立宪君主”的权限和努力范围而逃逸了，不得不使我们认为他感到被深究到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层面。战争对于天皇而言，他虽然尽了与自己职分相应的努力，但毕竟是发生了，因此他虽然承认战争是“令人悲痛”的不幸事件，但被追究在整体上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他却无法回答。也许这在天皇看来，是与其有关君主责任的严格规定完全不同领域的“文学方面”问题。在同一记者会见会上，记者请天皇谈谈关于广岛被投原子弹的感想。对此天皇却回答说：“对于广岛市民，我感到确实非常悲惨，但也无可奈何。”这大概与对待战争责任的提问同样，天皇缺乏接受和认识这种问题的精神境界。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还要作如下说明。^②

[注解]

1975年10月31日举行的记者会见会，是天皇第一次正式公开会见日本记者团。当时，刚刚结束访美归国的天皇，由于在访美前曾经会见美国方面的记者，所以访美归来也不得不会见日本的记者。这次会见记者，是把日本记者俱乐部作为日本记者代表的形式而进行的。虽然记者的问题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但由于天皇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所以“简直紧张得让人觉得可怜”（朝日新闻语），他字句斟酌地慎重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天皇对事前有所准备的提

①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书店，1964年，第124页、第129页。

② 下文这段有关天皇会见记者情况的说明和分析，在作者原著中是作为“注解”处理的。——译者注

问应付得还算可以,但对其他相关问题的回答却非常失败。天皇事前未准备好的相关问题有两个,即前文提及的战争责任问题和广岛被投原子弹的问题。短短三十分钟的记者会见会,可想而知这两个问题都是选了又选的,然而天皇却奇妙地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回答,导致了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作为君主的能力的印象。宫内厅长官宇佐美为此事辩解说:“因为天皇以前只有自己向别人提问题的经历,而没有被提问的习惯,所以他的意见没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因此朝日新闻在1975年11月1日的报道中说:“像这样的记者会见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举行。”

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君主语言能力的怪异话题,从这种角度审视一下近代天皇制的面貌。

R. 罗维广泛探讨了美国印第安的酋长制,认为所谓酋长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第一是能带来和平的仲裁者;第二是毫不吝惜自己的财物而满足被统治者的需求;第三是只有能言善辩者才能获得酋长之位。^① 这里与我们的讨论问题相关的是第三个条件。例如卑弥呼,她对人们提出来的任何问题,都能立即降下神谕,绝不会在话语上露出缺点。君主的舌辩能力随着其权力的发展会有所衰退,天皇制那样的神圣王权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前述的昭和天皇的记者会见,可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据P. 卡拉斯特所说,在原始的酋长制中,由于要求酋长具备雄辩能力,所以“酋长的活动会被封闭在话语世界,即处于与暴力完全相反的位置”。^②

或许,近现代欧洲的君主们,均具有远远超过昭和天皇的雄辩能力,他们都需要靠雄辩解释和宣传自己的立场和作用,但这是因为君主制也必须适应市民社会这一话语系统的世界。在最近有关天皇制

① 卡拉斯特·P. 著:《反抗国家的社会》(渡边公三译),书肆风之蔷薇,1987年,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192页。

的议论中,有些人主张应该学习欧洲的君主制,进一步向着“开放的皇室”而努力。对于这种常识性的主张,很多人持反对态度,强调说天皇的权威只有与一般国民相隔离才能得以保持。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害怕天皇一旦亮相在市民社会的话语世界中,其神秘性就会荡然无存。

如此看来,天皇只是一个矮小的权力有限的人,是一个狭隘限定自己的权力,只会强调为自己的职分而尽了努力的人。这与近代日本社会中广泛接触民众的天皇,可说是判若两人。如果说现实的天皇是这样一个权力有限的矮人,那么作为巨大权威的天皇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能君临日本呢?因此我们不得不研究在生身的天皇与作为权威的天皇之间,到底介入了什么要素。本书的研讨的对象正是人们意识中的这种天皇形像和观念,以及其权威性的存在模式。这种作为权威的天皇,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其权威性虽然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习惯“有此一问”。而对于那个时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会对这个问题会觉得莫名其妙和缺乏现实感,也属于难以有此一问的层次。现在,要将这一问题作为一种有体系的精神史过程从内部进行理解和使其对象化,就需要我们运用近乎于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者那样缜密的程序和媒介性思考进行研究。亦即说,这虽然是一个离开天皇本人就无法解开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而言,它属于一个应该与天皇本人相区别的、广大民众的幻想过程问题。

2. 连续论与断续论

众所周知,有一种观点认为天皇制是从很古的时代一直连续下来的。持这种立场的典型观点是强调皇位万世一系,将大尝祭视为基于古老传统

的礼仪,并视其为皇位继承礼仪的核心。这种见解被称为“连续说”,天皇制拥护派必然都持这种观点。在现代,这种观点的根据大都求诸于天皇不亲政论和“祭祀论”。实际上,即便主张“连续论”,也未必都一定是天皇制拥护者。例如山口昌男的基于人类学的王权论、宫田登基于民俗学的活神——天皇信仰论,以及历史学家纲野善彦、尾藤正英等,都从各自的立场论述了天皇制的连续性,试图以此阐明可谓支撑天皇制的深层结构。

与此相反,批判天皇制的历史学家们大都强调天皇制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是连续性的。如果我们具体把握了围绕天皇制的政治过程,就会明显地看到天皇制断续的一面。例如,摄关家和院政掌握权力的时代,中世和近世许多天皇年幼不掌权的史实,由足利氏拥立控制的北朝,今谷明论证的足利义满策划的“王权篡夺计划”^①,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朝廷的利用,以及德川氏彻底支配朝廷等等,都充分表现了天皇制的断续面之大。并且,虽说上述观点的骨架依然被维系着,但在最近有关天皇制的热烈讨论中,对迄今研究的空白区——中世和近世的朝廷天皇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仅就历史学领域的最新状况而言,有关各个时期朝廷权威的状态、政治权力与朝廷关系的特征等,都被具体地揭示出来,为我们研究天皇制提供了新的材料。

如果说把这种历史学家的立场称之为“断续论”的话,那么我自己也是主张断续论者之一。我一直强调,在我们极其普通的观念中,所能想象到的天皇制的内情,实质上是在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的近代化过程中制造出来的。诚然,在天皇制相关的制度和观念中,也有不少内容与古之由来相关。但我认为,这些与古之由来相关的内容,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被用作了近代天皇制建构的材料。用古老传统之名建构国民的同一性,实现国民国家的统一,这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质之一。将这样可谓伪造的建筑物——近代天皇制作为对象而进行解析,便是本书的课题。

^① 今谷明:《室町的王权》,中央公论社,1990年。